

院藏日本歸還文物拾零

高仁俊、嵇若昕

楔子

那日，我們聊起國立中央博物院（以下簡稱中博）的藏品，隨手翻閱杭立武先生編著的《中華文物播遷記》，不經意翻到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由他具名發文給當時中央信託局的一封信函（圖一、附錄），首先我們被印入眼簾的「翡翠屏風」數字吸引，遂詳讀這件公函；原來是當年中博為了接收日本歸還的「翡翠屏風」等物件，特派時任專門設計委員的李霖燦先生攜帶正、副本空白領據、印鑑樣式，前往中央信託局洽辦接收手續的照會公函。

文物接收、運台拾零

這已是一甲子以前的往事了，當時杭立武先生擔任中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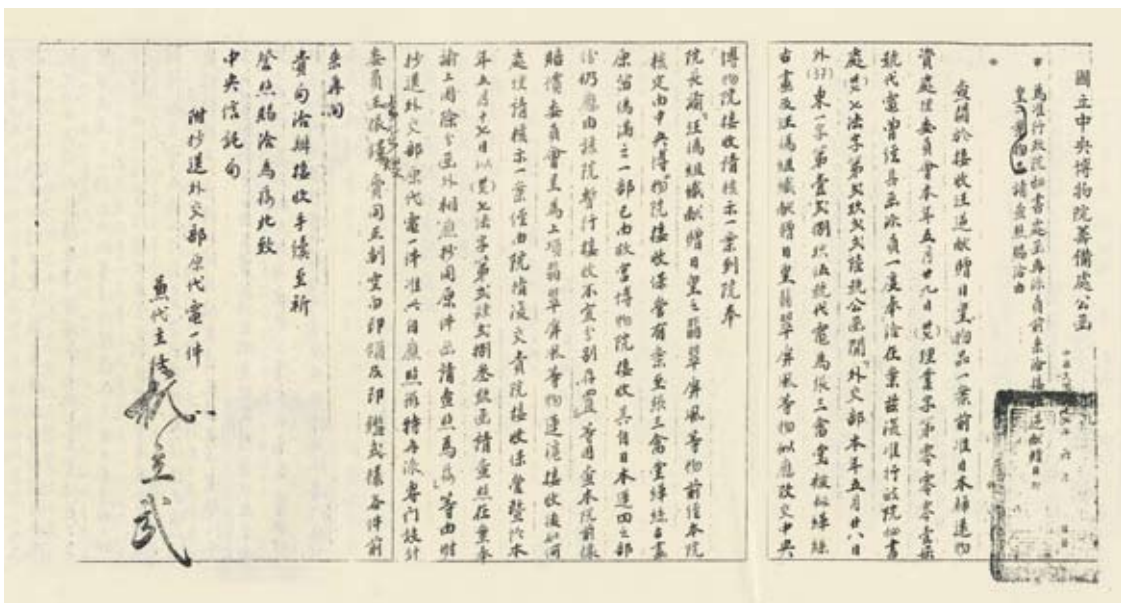
籌備處兼代主任。對日抗戰勝利後，當時的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第三組負責辦理日本賠償與歸還工作，即是要求日本將戰爭期間掠奪去的物資歸還。

因此，民國三十五年秋成立了中華民國賠償歸還代表團，五位代表都是第三組工作人員，第三組組長吳半農（一九〇五—一九七八，原名祖光，號曲林，安徽涇縣人）身兼首席代表。翌年九月，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增設了賠償及歸還物資接收委員會（簡稱「接委會」），其主任委員和委員就是中華民國賠償歸還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和代表。

為便於歸還與接收工作的推展進行，行政院另外在國內成立了賠償歸還物資督運委員會與歸還物資處理委員

會，以便接續其工作。吳半農於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所記的文章中回憶道（註）：在被劫物資的歸還工作方面，截至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底止，兩年多期間所歸還的物資折合當時市價共約值一千八百一十三萬二千三百五十八美元，其重要者可分五大類：第一類、銅鎳幣，估計共值五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六美元；第二類、整廠機器設備，包括永利化學公司氫廠的硝酸製造設備與廣東造紙廠。第三類、計件機器，共歸還二千五百四十五件又一套，約值二百二十餘萬美元。第四類、船舶，共計十二艘，二萬零六百七十六噸，約值二百一十六萬





附錄
國立中央博物院三十七年六月函中央信託局洽領汪
逆獻贈日皇之翡翠屏風等物原卷釋文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公函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日發

事由：為准行政院秘書處函再派員前來洽接汪逆獻
贈日皇物品一案，請查照賜治由。

查關於接收汪逆獻贈日皇物品一案，前准日本歸
還物資處理委員會本年五月廿九日（卅七）理業字
第零零壹柒號代電，曾經具函派員一度奉治在
案。茲復准行政院秘書處（卅七）七法字第貳玖貳
貳陸號公函開：「外交部本年五月廿八日外（37）東
一字第壹貳捌玖伍號代電，為張三齋堂被劫緝絲古
畫及汪偽組織獻贈日皇翡翠屏風等物，似應改交中
央博物院接收，請核示一案到院，奉院長諭：「汪偽
組織獻贈日皇之翡翠屏風等物，前經本院核定由中
央博物院接收保管有案，至張三齋堂緝絲古畫原留
偽滿之一部已由故宮博物院接收，其自日本運回之
部分仍應由該院暫行接收，不宜分別存置」等因。
查本院前據賠償委員會呈：為上項翡翠屏風等物運
遞接收後如何處理，請核示一案，經由院指：復交
貴院接收保管，暨於本年五月十七日（卅七）七
法字第貳貳捌參號函請查照在案。奉諭上因除分
函外，相應抄同原件函請查照為荷」等由，附抄送
外交部原代電一件，准此自應照辦。特再派專門設
計委員（按：此處原簽為「王振鐸」，被點掉，旁
另寫「李霖燦」三字）李霖燦齋同正副空白印領及
印鑑式樣各件，前來再向
貴局洽辦接收手續。至祈
察照賜洽為荷。此致
中央信託局

附抄送外交部原代電一件

兼代主任 杭立武

圖一 國立中央博物院三十七年六月函中央信託局洽領汪精衛獻贈日皇翡翠屏風等物原卷影印本及附錄
（翻拍自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台北：商務，民國六十九年，頁100-102）

二千六百五十七美元。此外，還有三艘可核定歸還。第五類、圖書與古物。據當時國內調查，戰爭期間損失的書籍不下三百萬冊，歸還的總共有十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三冊，有善本與普通本，估計共值十八萬餘美元。至於被劫的古物種類繁多，主要有字畫、拓本、佛像、寺鐘、刺繡織品、家具、飾品、雜物等。

吳半農回憶這批被劫歸還的古物中，最貴重的是「翡翠屏風、緝絲古畫、白玉壺一對」，當時由在日本的接委會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專程派海遼輪接運回國。運送之前，駐日代表團先於當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當時辦公處所，即東京麻布區（現為港區）養正館大樓，舉行相當規模的展覽會，除了前述貴重古物外，也搭配其他珍貴古物一起陳列，並舉行雞尾酒會，以資紀念。

吳半農記得，這批珍品運抵上海後，交由中央信託局儲運處點收，屏風玉器和緝絲古

畫復交南京的中博和故宮博物院分別簽領。

前述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杭立武先生具名發文給中央信託局的公函中也指出，「張三畚堂」（三畚堂是張作霖的堂號）的緙絲古畫由故宮博物院接收，「翡翠屏風」等物則由中博保管。吳半農回憶這批緙絲古畫共五十八軸，包括「明清繡物」二十七軸，原由清宮收藏，「後歸朱存素黨」（即朱啟鈐，堂號存素），最後輾轉歸「張三畚堂」，張氏（此處指張學良）又移贈瀋陽博物館（此點存疑，見下文）。戰爭期間，該館將其送往東京裱裝，遂無下落。駐日代表團派員密查後確知在某日人家中，幾經交涉才經盟軍轉飭歸還。至於「翡翠屏風」等物，則是汪精衛於民國三十年六月訪日時贈與日本天皇家族的禮物。

除了前述珍品外，吳半農記得日本宮內廳還陸續歸還一批古物，其中包括清高宗乾隆皇帝墨跡四大冊、康熙時代瓷瓶一尊、宋坑端硯二方、象牙

塔一座、象牙球一具、乾隆時代精雕端硯一對等。這些珍品都是偽滿洲國派大員獻贈日本天皇的。

吳半農認為最貴重的一「翡翠屏風、緙絲古畫、白玉壺一尊、翠玉花瓶一對」歸運至上海後，中博將其中的玉屏風與玉壺、玉花瓶接收保管，並於民國三十八年初與其他第三批文物由南京遷運來台。譚旦厝先生在其所撰《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中載錄：中博工作人員於元月九日開始準備第三批運台文物，擔任運輸的海軍崑崙艦於元月二十八日抵達南京，這一天已是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的前一日，碼頭工人不願意裝運，幸好工會方面於事前已經接受訂金，經過軍警疏通，並加發新年特別獎金，才勉強答應，連夜搬運入艙。二十九日開始裝船，三十日離開，第二天抵達上海，中博的押運負責人是索予明先生（如今高齡八十九，身體依然康健）。崑崙艦在上海停靠了一個多星期，索予明先

生曾回憶道：當時曾發生艦長態度不穩的狀況，萬幸未曾釀出不可彌補的禍端。最後崑崙艦終於在二月九日離開上海，二十二日抵達基隆；二十三日開始分批運抵台中；二十八日完成入庫工作。

杭立武先生在他的書中記載，第三批運台文物航行達二十四天之久，「是第三批運輸中最慢的一次」，書中還附錄了當時崑崙艦副艦長褚廉方親筆所寫的一篇〈國寶運台記略〉，在他的回憶文中寫到，所裝載的一千二百多箱文物已佔據了官兵寢艙、飯廳，乃至醫療室，真可謂「滿坑滿谷」，所以他下令封艙，可是杭立武與索予明兩位先生「懇切表示，尚有四箱翡翠屏風等玉器，係抗戰勝利後自日本皇宮接收回國，不僅價值連城，且為我國八年血戰後所獲最富意義之紀念品」，於是再下令把官兵寢室之辦公桌椅撤除，以裝運這四箱玉器。

政府播遷以後，其餘從日本歸還的物資均改運台灣高



圖二 陳列於行政大樓東門前的日本歸還之大銅鼎（中日銅1）

雄港，其中屬於古物者交由當時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簡稱聯館處）接收，其實是聯館處內的中博組負責，前後共有六批，共一百零五箱。第一批運抵高雄後中博派員到高雄接運回台中北溝，於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與二十五日開箱清點；第二批於同年七月二十七日開箱清點；第三批於八月間抵達高雄，九月五日在台中開箱清點；第四批與第五批同時於翌年（民國

四十年）運抵，並同時於五月二十六日開始清查；第六批於七月二十九日在台中開箱清點。民國四十五年奉教育部令，移交了五十一箱文物予國立歷史博物館（當時名稱為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

中博接收的文物

日本歸還而由中博接收保管的文物甚為龐雜，除了有調查考古出土古物外，還包括數百冊戰前我國學術界刊行的自然科學雜誌，諸如：《靜生生物調查所彙報》、《中國植物圖譜》、《中國動物圖譜》、《中國北部植物圖誌》、《蕨類植物圖譜》、《古生物誌甲種》、《古生物誌乙種》、《中研院動植物彙刊》、《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動物學專刊》、《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彙報》以及《香港自然科學雜誌》等等。茲為行文便利，分成政府播遷來台後直接運抵高雄的文物，以及運抵上海的四件汪精衛獻贈日皇之玉器兩個部分，擇其菁要簡介述之。

直接運抵高雄的文物

經瞭解，這六批文物中也不乏精品，有的甚具歷史意義，例如第四批文物中有一件大銅鼎，乃日軍入侵南京後，在南京兵工廠鑄造完成運至日本，當民國五十四年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台北故宮」）成立時，當時曾另行鑄造梅花與國父遺訓和博愛二字的銅質零配件，以遮掩櫻花和其他文字。隨後長期陳設於外雙溪故宮展館前大樓梯平台上，迎接著前來參觀的遊客，民國七十年代後期又移至行政大樓前，迄今仍在。（圖一）

凡到過台北故宮，並且從山下沿著長長的階梯走上陳列館的遊客往往會注意到，在「天下為公」牌樓後方兩側各坐著一隻大銅獅，造型威猛中帶著一股親切與可愛，但是知道他們是民國五十年代，當時故宮同仁孫超先生依據一對日本歸還的大理石獅子放大翻鑄而成之人，可能已不多了。如今孫超先生已是海內外知名的陶藝家，以擅長燒製結晶釉享



圖三 清末民初 大理石獅 一對（中日雕1、2）

譽藝界。當時他所依循的這對石獅子收貯在存放文物的山洞門口，民國七十二年左右，它們被陳列在當時一樓大廳兩個柱子前，撕完門票後，遊客抬眼就可瞧見這對可愛的白色大理石獅，正展露笑容歡迎

著大家。如此潔白的大理石，乃產自河北保定市曲陽縣，歷來人們稱之為「漢白玉」。經過了二十多年，訪客每每站在它們面前欣賞、觸摸與品評的結果，它們的額頭已髒污泛黃了，四年前因為正館整修工程而再度收貯，仍如往昔般鎮守著山洞庫房。（圖三）這對漢白玉獅也是從日本運抵高雄的歸還品。

第五批運抵高雄的文物主要是戰爭期間日人發掘遼陽漢墓中所獲出土文物，但是以明器為主，這批文物是當時日本東京大學助教駒井和愛等人於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三年，前後三次調查、發掘所得。昭和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日人曾印行《遼陽發現之漢代墳墓》報告，經比對後可知，精品並未歸還。除了這批明器，第五批歸還文物還有日人於遼陽北園採集的明器瓦當殘片，以及於灤平採集的瓦當殘片與石器。此外，尚有在昔日渤海國境內採集的瓦當、石佛與光背殘片。第二個千禧年時，在院

藏漢代文物大展中曾展出部分遼陽漢墓出土的明器。（圖四）至於渤海國的石佛也曾於二十多年前展出過。

第六批文物為山東曲阜漢初魯恭王所修建的靈光殿遺址之瓦磚殘片及成樂遺物，這個遺址是民國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原田淑人主持發掘的，其中有漢代的石板研和研子，雖然板研光素無紋，研子紐頂僅有簡略的陰線刻紋，但是不論原來的北平故宮博物院或者中博都沒有同類藏品，對於述說古硯的發展史，甚具意義，也是目前台北故宮所收藏的數百方古硯中，時代最早的一套。（圖五）

前述吳半農所記得之日本宮內廳歸還的一批古物應該是屬於第三批運抵的古物，因為前副院長譚旦罔在《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書中簡述六批文物的內容時，僅在第三批有象牙雕刻與瓷器。目前台北故宮器物處所典藏文物中，屬於在台灣接收保管的日本歸還古物共有四十九箱，歸類為



圖四 遼陽漢墓出土陶明器舉隅：陶井（中日陶125、126）、陶灶（中日陶43、36、37、39、45）、博山爐（中日陶47）



圖五 漢 石板研與研子（中日雜57、59） 山東曲阜漢初魯恭王靈光殿遺址出土

「中台雜」箱，其中第十一箱就有清高宗的四冊書跡：「乾隆宸翰」（中日書1、2、3、4）、康熙瓷瓶一件（中日瓷5）、象牙塔一座（中日雕31）、象牙球一具（中日雕5）、乾隆時代精雕端硯一對（中日文1、2），至於清代以前端硯僅有一方（中日文1）。



圖六 清晚期 象牙塔（中日雜31）

其中，象牙塔曾長期陳列於觀眾面前（圖六），這是一件深具清晚期南派牙雕特色的作品，塔分九層，每層六面，內坐一佛，飛簷懸吊鈴鐺，玲瓏活動，曾吸引無數觀眾的目光。至於象牙球（圖七），由九段組成，主球超過二十層，最外層鏤雕多層次雲龍紋，底座亦雕飾同類紋樣，其上一節則鏤飾八仙人物，雕工繁複，玲瓏剔透，是標準清晚期廣東地區牙匠的作品。這件象牙球未來或將長期陳列於嘉義故宮南院，成為探索在西潮影響下的亞洲為主題的常設展中的實例之一。台北故宮近年所監製且十分受到歡迎的「3D虛擬文物動畫影像作品集」中，與翠玉白菜、毛公鼎、轉心瓶、橄欖核舟並列的象牙球，就是選用日本歸還的這具象牙球之最大球拍攝者，已可謂赫赫有名了！

吳半農曾表示，日本宮內廳歸還的這些珍品都是偽滿洲國派大員獻贈日本天皇的。若然，不排除與末代皇帝溥儀有關，原都是皇家珍寶，若不是

出自於紫禁城，就是收貯在某個行宮中。

在吳半農的記憶中，從日本皇室歸還的文物還有末代皇后婉容具名贈與日本皇后的翡翠戒指和珠鑽鑲金手鐲。如今在收貯前述四冊乾隆皇帝書跡、康熙瓷瓶、象牙塔、象牙球和三方端硯的「中台雜」第十一箱中，就有翠玉戒指和金嵌珠鑽手鐲各一件，點查號分別是中日玉1與中日雜7，不知是否即是它們？

除此之外，這六批日本歸還的文物中，尚有一件夾紵金漆觀音大士像，雖然無法確知運抵的時間，但它是清末福州沈氏漆工的作品，全器高約七十三公分，重僅一·二公斤，提取時輕若無物，器底有中文「中華福州沈紹安蘭記」與英文SHEN SHAO AN LANG KEE FOO CHOW, CHINA.」商標，「福州沈紹安蘭記」乃閩南語發音的羅馬拼音文字。（圖八）這尊觀音大士的威儀法像中帶著無限的慈祥，面對著她總讓人不禁自心底升起一股安靜祥和的情緒！



圖七 清晚期 象牙球（中日贈5）

汪精衛獻贈日皇的玉器

至於汪精衛獻贈日皇的屏風與玉瓶，如今當然都屬於台北故宮的重要珍藏。玉屏風（點查號：中玉624）（圖九）也曾長期陳列於三樓玉器陳列室中，民國九十三年才因為陳列室整修而收貯入庫，圖九就是當時它展示於世人面前的實況。由於同仁研究成果的推進，目前已知原名之為「翡翠屏風」並不恰當，其實應是屬於新疆和闐角閃玉中的碧玉，在吳半農記憶中，它「是八折式，高約六英尺，楠木雕刻，鑲嵌翠玉四十塊」，其實每扇從上到下鑲嵌了六塊大小不同的碧玉，一共鑲嵌了

四十八塊碧玉。楠木屏風滿雕纏枝花卉，每塊玉也都雕琢花卉紋飾，顯得富麗堂皇。

一對碧玉瓶（中玉625、626，吳半農作「翠玉花瓶」），蓋紐各高高地雕琢出一隻回首直立綬帶鳥，雲芝雙耳帶活環，器身浮雕浮雲、梅樹與綬帶，寓意「眉壽」。這對碧玉瓶的紋飾母題雖然相同，但是細部安排並不完全一樣，各具姿態。（圖十、十一）至於白玉壺（中玉627），除了白玉無瑕外，雕琢工藝更精美，高浮雕幾達立體的牡丹、鸚鵡鳥與綬帶鳥，寓意富貴、平安與長壽，令人愛不釋手。全器除了附帶一個

鏤空纏枝花卉紋飾的木座外，還有一個硬木製成盒，盒蓋簽條上墨書楷體：「皇太后陛下賜存，汪兆銘敬獻」數字，原來是汪精衛贈送給日本天皇母親的禮物！（圖十二）

中博同仁當年在南京接收這批玉器時，就聽說它們是汪精衛為了祝賀日本天皇的母親壽辰而親攜赴日，所以它們的紋飾也都與祝壽有關。

故宮博物院接收的絲繡

吳半農記憶中的這些歸自日本而最貴重的「翡翠屏風、縹絲古畫、白玉壺一尊、翠玉花瓶一對」，凡由中博接收保管者，因為文物編號或舊有品名清晰，目前幾乎都能在台北故宮的器物處覓得，至於五十八軸縹絲古畫運抵上海後，經當時中央信託局儲運處點收後，交由故宮博物院簽領。杭立武先生具名發文給中央信託局的公函中也申明：奉行政院長（時由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諭，因為「張三畚堂縹絲古畫原留偽滿之一部已由故宮博物院接收」，所以自日

本運回的這批繡絲古畫「不宜分別存置」，仍應由故宮博物院保管。

因為戰爭因素，當時故宮博物院分居北平與南京兩地，王世襄先生回憶抗戰勝利後，他在京津地區從事文物清理工作時，曾在朱啟鈐的關心下，於民國三十五年呈文建議國民政府設法收回原由朱啟鈐收藏而當時存於東北的絲繡。嗣後王世襄先生因奉派赴日本參與文物清理追償的工作，而未再

親自參與點收這批絲繡。（王世襄，〈回憶抗戰勝利後我參與的文物清理工作〉，《文物天地》，一九八六年第五、六期與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在王世襄先生的記憶中，民國初期，朱啟鈐曾蒐集一批宋代至清代的繡絲、刺繡，大約二百件，曾一一著錄入《存素堂絲繡錄》（民國十七年刊行），後來以二十萬元售予張學良，一直存在東北邊業銀行內，後來溥儀的滿洲國曾在

日本將這批絲繡公布，出版成《纂組英華》（昭和十年出版，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圖錄室典藏一套）。抗戰勝利後，這批絲繡存貯於長春，緊急運到北平後，王世襄先生僅「聽說這批絲繡已撥交給故宮博物院」。吳半農的回憶中曾說，張學良曾將他所收購的存素堂絲繡捐贈瀋陽博物館，但是王世襄先生的回憶文章中並未提及。

從杭立武先生具名發文給中央信託局的公函中可知，當時從東北運至北平的這批絲繡已由北平方面的故宮博物院人員接收保管。至於從日本收回的五十八軸絲繡運至上海，故由當時在南京的故宮博物院人員接收。

台北故宮書畫處典藏的絲繡文物原都屬於遷運來台的故宮博物院藏品，所以目前都以「故絲」編號，一共有二百二十三件，幾乎每一件都有當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的千字文號，但是其中「故絲106」至「故絲223」卻沒有千字文號，它們正巧是「五十八



圖八 清末 金漆夾紵觀音大士像（中日漆1）



圖九 民國 雕木嵌玉屏風（中玉624）

軸」，其中逕名為刺繡者有二十六軸，另有兩軸戳紗宮燈小景（故絲182、183）。中國北方所稱戳紗，在南方稱納紗（《存素堂絲繡錄》，卷下，頁三十一），是刺繡工藝的一支。因此，這批沒有千字文



圖十一 民國 碧玉瓶（中玉626）



圖十 民國 碧玉瓶（中玉625）

號的五十八軸絲繡中，應有二十八軸是「明清繡物」。吳半農記憶中，日本歸還的五十八軸張三畬堂（或稱存素堂）緯絲古畫中，有二十七軸「明清繡物」，與台北故宮書畫處典藏而沒有千字

文號的刺繡文物相較，兩者僅差一軸。其實《存素堂絲繡錄》收錄的緯絲與刺繡共僅五十八件，經比對後，台北故宮的這五十八件絲繡文物，僅有十二件收錄入該書，即「緯絲祝枝山草書軸」（故



圖十三 明 緙絲桐封秋實團扇軸（故絲167）

絲166）、「明緙絲桐封秋實團扇軸」（故絲167）、「明緙絲芝蘭並秀紈扇軸」（故絲168）、「乾隆緙絲花鳥宮屏軸」（故絲169、170）、「乾隆緙絲天喜圖軸」（故絲171）、「乾隆緙絲博古花卉集錦軸」（故絲172）、「乾隆緙絲三星圖頌軸」（故絲184）、「乾隆緙絲歲朝圖軸」（故絲185、186）、「乾隆緙絲御製詩句篆書七言聯」（故絲199、200）。其中，「明緙絲桐封秋實團扇軸」緙織藍地桐葉、桐子、榴食、蓮房、蓮實、菱角，收傳印記有



圖十二 民國 白玉壺（中玉627）

「項墨林秘笈之印」、「怡親王寶」、「皇十一子印章」與「朱啟鈴印」，所以明代此件作品曾經大鑑賞家項元汴珍藏，清代又先後入怡親王與成親王（即皇十一子）家藏。（圖十三）至於「乾隆緙絲博古花卉集錦軸」緙織白地畫博古瓶尊、折枝花草，奇木與几案雜陳，觚尊與瓷器紛列；全幅設色富麗，畫工多而緙工少，前人以為「是乾隆末年所造之寶品」；收傳印記有「蠖公所寄」與「朱氏存素堂藏絲繡考」，這兩方都是朱啟鈴的收藏印，存素堂是他的齋堂號，他晚年又號蠖公；（圖十四）由此可窺知，存素堂蒐藏的絲繡的確名不虛傳。

台北故宮書畫處所藏沒有千字文號的五十八件絲繡文物，僅有十二件緙絲作品可於《存素堂絲繡錄》中覓得，二十八件「明清繡物」並未在其中。雖然如此，種種跡象仍讓人不免推論：目前台北故宮書畫處典藏而原為故宮博物院藏品的這五十八件沒有千字文號的絲繡，或即屬於日本歸還



圖十四 清 乾隆 絳絲博古花卉集錦軸（故絲172）

的文物，也是吳半農記憶中所稱原為屬於朱啟鈞的收藏，後來售予張學良的「絳絲古畫」。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杭立武先生具名發文的公函中，則稱作「張三畬堂被劫絳絲古畫」。

不論吳半農或杭立武先生皆稱其為「絳絲古畫」，乍看之下不免容易讓人誤作「絳絲、古畫」，也就是有絲繡與

畫作，但是幾經比對各方資料以及台北故宮書畫處所典藏的這五十八件無千字文號的絲繡文物，它們都裝裱成立軸樣式，而且構圖皆作傳統書畫形式，織繡的時間又屬於明清兩代，所以他二人皆稱作「絳絲古畫」，或許是當時文物界的通名吧！

後記

台北故宮有近六十五萬件藏品，享譽海內外，其中有很多馳名中外的國寶或重要古物，世人多熟悉它們是清宮舊藏為主，即使知道原中博曾典藏如毛公鼎這樣知名的國寶，也多未曾留意還有一批自日本歸還的文物。這些文物除了本身的歷史文化古物價值外，背後還具有近代史料價值。更有甚者，它們還訴說了一段抗戰史實，和文物在播遷中的危機，以及跨越台灣海峽黑水溝時的危險。在天時地利與人和各方面的配合下，這批文物方能安然無缺地珍藏在外雙溪，且不時零星參與各類主題展覽，在世人的面前展示榮姿。

高仁俊為本院器物處退休人員
嵇若昕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吳半農，〈日本對華賠償歸還工作史實〉，原文刊登在中共全國政協資料《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二輯，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本文乃依據《二戰網·二戰歷史·中國戰場》，http://www.2wanw.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975&ArticlePage=1-4，檢索日期：二〇〇八年四月廿一日。